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6)

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说 明

这里选印的两件材料，第一篇是以列宁的有关著作作为主要依据编写的，它着重说明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策略问题；第二篇是任清玉同志译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的一篇论文，它主要说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争取团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建立第三国际的斗争。这些材料，有助于我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课程的有关章节的教学和科研。

目 录

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1
一、恩格斯逝世到斯图加特大会.....	2
二、哥本哈根大会到巴塞尔大会.....	10
三、大战爆发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	16
四、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	24
五、昆塔尔会议.....	31
六、齐美尔瓦尔得的破产与第三国际的建立.....	36
附录：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几个文件.....	39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团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而斗争的历史简述.....〔苏〕亚·彼·斯米尔诺娃.....	49

列宁在第二国际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列宁在第二国际内部进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从这个时候到1919年初建立第三国际，经过了十五年。

列宁从开始参加国际活动时起，就高举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败坏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斯图加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以及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虽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始终处于少数地位，有时甚至非常孤立，机会主义一直占优势地位，但由于列宁光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进行了艰巨的、复杂的工作，团结了左派，引导着广大群众向右派和中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击溃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这份材料着重说明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列宁的有关著作是这份材料的主要依据。

这份材料一共分为六节：第一节从恩格斯逝世以后到1907年以前（包括伦敦大会、巴黎大会、阿姆斯特丹大会和斯图加特大会），主要是介绍斯图加特大会的情况；第二节从1907年至大战爆发前（包括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主要是介绍巴塞尔大会前后的列宁的活动及大会通过的宣言；第三节到第六节从1914年7月底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段期间（包

括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等会议），主要是叙述列宁揭露机会主义的背叛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团结左派和为建立第三国际所进行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

此外，我们还选择了若干文件作为附录。

一、恩格斯逝世到斯图加特大会

（一）伦敦大会和巴黎大会

在恩格斯逝世（1895年）后的几年间，第二国际曾召开伦敦大会（1896年7月）和巴黎大会（1900年9月）。这时候，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发展起来，伦敦大会和巴黎大会的决议都表现了机会主义观点。

列宁没有参加这两次大会，但在《怎么办？》等著作中同俄国和国际机会主义作了无情的斗争。他把国内反机会主义斗争和国际反机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在批判俄国经济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

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这本著作中，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他还说：“费边社分子与社会民主派间，民意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间的争论，始终只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争论，只是反映出个别国家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在这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派进行的真正的国际性搏斗中，也许会充分地巩固起来，足以消除早已

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页底注①）

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引证了恩格斯在1874年的话：“德国工人现在居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的地位占据多久，这是无法预料的。”

“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列队行进时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列宁全集》第5卷，第339—340页）

列宁说：“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要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列宁全集》第5卷，第340页）

（二）阿姆斯特丹大会前后

第二国际在1904年8月举行阿姆斯特丹大会。这时，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更为加强，斗争更加尖锐，分裂为左、中、右三派。

在1903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阿姆斯特丹大会进行了斗争。他们揭露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的嘴脸，取得了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

列宁虽然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但实际参加了编写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大会上讨论了革命的策略问题，法国的饶勒斯为改良主义策略辩护，认为社会党应同资产阶级合作并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德国的倍倍尔批判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策略，但他仍然回避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大会通过了各国建立统一的社会党的决议，但决议没有说明这种统一应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拒绝执行这个决议，坚持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活动，不同孟什维克统一。

在俄国党分裂问题上，国际机会主义者完全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甚至左派卢森堡也攻击列宁，他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文章，歪曲地介绍了列宁论述俄国党思想原则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说列宁这本书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倾向，说列宁是：“纯粹布朗基主义”，说列宁写的都“是一些泛泛之谈、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以及绝对真理”，说列宁“死板教条，向马克思的辩证法求救。”（《列宁全集》第7卷，第466—470页）考茨基表面上装得不偏不倚，但暗中支持孟什维克，拒不发表列宁反驳卢森堡的文章。

1905年，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三大，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并污蔑说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国际局的机会主义领导，站在孟什维克一边，提出对俄国党的分裂实行仲裁。列宁坚决回击了这种攻击，并提出国际局的调停要在两派谈判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列宁在1905年10月被任命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列宁认为向国际报告党内的情况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他号召大家为捍卫三大的立场而进行大力宣传，揭露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立场。

（三）斯图加特大会

斯图加特大会（1907年8月）在第二国际的历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是列宁第一次出席的国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列宁在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以少数战胜多数的一个范例。从这次会议出席代表的成员来看，机会主义分子占多数，而且居于领导地位，但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来说是符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列宁写了两篇论述这次大会的文章，均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列宁说：“斯

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果断地确定了这条革命社会民主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列宁全集》第13卷，第69页）。

一向在第二国际起着领导作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会上表现了动摇，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在这次代表大会中的领导作用，执行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在组织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会议开始时，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际局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担任全体会议的主席。同时他们并派出自己的重要成员来担任大会最主要的几个委员会的领导。如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是由德国党的代表修得功担任的，党同工会关系问题委员会的书记是由考茨基担任的。德国党还使自己的代表团成员形成了大会的多数，虽然大会规定，各主要国家党的代表权相等，各为20票表决权，而德国党实际上攫取到50票表决权。德国党一方面让极右翼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达维德、列金、谢德曼、福尔马尔等人参加代表团出席大会；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尽一切办法阻碍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卢森堡参加大会，但卢森堡最后终于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表决权，不过不是以德国代表资格参加的，而是以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资格参加的。除此以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利用自己在第二国际的传统地位和影响，诱劝外国代表赞同他们的机会主义方针。

俄国党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代表团中包括社会民主党支部和社会革命党支部，而社会民主党支部又分为布尔什维克分支部和孟什维克支部。以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为首的孟什维克支部和社会革命党支部是紧紧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在一起的。

出席大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数很少，列宁所能依靠

的力量，只有以卢森堡、马尔赫莱夫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以蔡特金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图加特大会就是在国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这种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举行的。大会讨论的最重要也是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军国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会之前的第二国际的多次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斯图加特大会召开时，国际关系紧张，军备竞赛空前加剧，形势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解决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所以又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在会议上提交讨论的一共有四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个是饶勒斯和瓦扬代表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提出的；一个是盖得代表法国社会党的少数派提出来的；最后一个是法国社会党极左翼爱尔威提出来的。会上着重讨论了倍倍尔和爱尔威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

爱尔威的决议草案提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所有战争都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任何战争”。列宁指出，“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观点”，“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同时“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反对战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13卷，第63—64页）。但列宁在批判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时，又指出，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因为爱尔威不象机会主义者那样主张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的手段，而主张群众的革命行动。

在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战争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被消灭以后才会消失，但是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任务。在这个草案中涉及到实际行动的地方，只有承认议会斗争形式。这个草案又把帝国主义战争的概念偷换为“防御的”和进攻战争的概念。列宁认为，这样就容易“使别人有可能戴着机会主义眼镜来阅读倍倍尔的正统原理”（《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页）。德国人福尔马尔在大会上的发言对倍倍尔的观点作了完全机会主义的发挥，他说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个很好的德国人”。列宁彻底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唯有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战争的防御性质和进攻性质出发，才能观察和解决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上的某种现象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3页）卢森堡在大会上发言，反对了德国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并且部分地反对了倍倍尔。列宁为了联合德国的左派共同向机会主义斗争，把自己参加起草委员会代表席位转让给卢森堡，同时并积极地参加了决议案的拟定。列宁赞同倍倍尔的决议案作为大会决议的基础，认为倍倍尔的决议案中有正确的部分，同时也易于加进自己的原理。此外，倍倍尔的决议案是代表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来的，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其他几个决议案容易通过。

列宁和卢森堡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须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列宁为了使倍倍尔接受自己的观点，

同倍倍尔进行过反复协商。后来列宁曾写道：“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修正案最后审定之前，曾同倍倍尔进行了长期的直接商谈。第一次审定时是很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鼓动和革命的活动问题。我们把它给倍倍尔看，他回答道：‘我不能采纳，目前检察机关对我们的党组织是放松了一些，在暂时还没有严重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在和法律专家商谈和多次修改以后，使得那同一个思想能够用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求得一个能够为倍倍尔同意采纳的最后的说法”

（转引自克鲁吉柯娃著《列宁在国际舞台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第99—100页）。为此，列宁还采纳了饶勒斯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决议中不要指出斗争手段（罢工、起义），而要指出无产阶级反战斗争的历史范例，从欧洲的游行示威开始到俄国革命为止。

列宁说：“经过这一番修改，决议虽然太长，然而这个决议真正有了丰富的思想，并且确切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决议既具有正统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用福尔马尔的眼光阅读不了这个决议，而幼稚的爱尔威思想的狭窄框子也容不了这个决议。”（《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65页）经过列宁修正后的决议案，在大会上得到一致通过。

关于殖民问题的讨论，机会主义者荷兰代表柯尔提出的决议草案里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柯尔的提案，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到多数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在大会的讨论中，伯恩施坦和达维德代表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发言肯定“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并猛烈攻击

激进派，说他们不了解改良的意义，没有切实的殖民纲领等等。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团结了没有实行殖民政策或深受殖民政策之苦的小国的代表，在大会表决时以多数票压倒了那些“连无产阶级也有些热中于侵略的国家”的机会主义者，而通过一个较为正确的决议案。

列宁在叙述这一斗争时说：“只有养活全社会的无产者阶级，才能进行社会革命。而广泛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养活全社会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几乎是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当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害处，了解它产生的原因，以便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去同这种机会主义作斗争”（《列宁全集》第13卷，第61页）。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国际机会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德国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会代表，他们最固执地坚持这个观点。普列汉诺夫为工会中立主张辩护，他说，“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是有害的”。列宁批判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使工会不同社会主义发生任何联系，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我们要永远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人中间去，特别是要带到所有的工人团体中去。大会通过了密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结束了对“工会中立”的原则承认。列宁在叙述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时说：“在斯图加特遭到否决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不少危害，德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立思想在

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的工会明显地倾向了机会主义”（《列宁全集》第13卷，第72页）。

这次大会以后，列宁提出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引用了恩格斯给左尔格信中的话：“在目前，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国会以后，有人出来同德国人争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来说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就绝对需要法国人竞争的刺激，而这种竞争是不会少的”（《列宁全集》第13卷，第69页）。

二、哥本哈根大会到巴塞尔大会

（一）哥本哈根大会

在1910年8月召开哥本哈根大会以前，列宁在国际局内同机会主义者多次地进行了斗争（例如，在吸收英国工党参加国际局问题上列宁反对考茨基认为工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在荷兰社会党内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分裂的问题上，列宁反对国际局对荷兰机会主义者的偏袒）。

1909年，德国党的报刊发表了一篇报导俄国党第五次代表会议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严重地歪曲了代表会议向取消派斗争以及其他情况，并且企图引起派别性论战。列宁为此向德国党中央提出了严重抗议。

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托洛茨基分子同德国机会主义分子联合，利用德国刊物攻击列宁。他们污蔑布尔什维克党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激进主义，污蔑中央委员会是“右倾”，要求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指出，这些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象兄弟般伸出了手来互相支援。

列宁出席了哥本哈根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委员会。在合作社问题上，法国的机会主义者饶勒斯的提案认为“合作社可以帮助工人准备实行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即是说，通过合作社，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饶勒斯并反对合作社可能成为“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辅助工具的提法，认为很难说事情会发展到剥夺的地步。列宁坚决反对这个提案，并提出一个彻底革命的决议草案，但这个提案未能通过。之后，列宁联合了盖得，提出了对小组委员会起草的决议的修正案，修正案在合作社的性质、作用、同社会党的关系等问题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代替了机会主义的提法，可是仍没有被通过。为避免因局部性的问题在大会上争论，列宁在大会上赞同了小组委员会的草案。这个草案成为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会后列宁指出：“我们固然不能忽视决议的缺点或向工人隐瞒决议的缺点，同时也应当指出，社会主义国际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做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应遵守通过的决议，本着决议的精神进行自己的各项工作。”（《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1—282页）

列宁说：“哥本哈根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可以说，它主要是向广处发展着，并且开始把无产阶级合作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已经显露出来，但是离修正主义者提出独立的纲领的日子还远。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拖下去了，但是这个斗争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2页）

哥本哈根大会后，列宁继续与国际机会主义进行斗争。1910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了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会上革命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围绕着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展开了异常尖

锐的斗争。

列宁在《两个世界》一文中评价这次会议，认为这次大会上的争论“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两个思想世界和两种阶级倾向”。列宁说：“可见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的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总不免进入最后阶段，要导向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摧毁。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立宪制度的浮华外表，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坐在一个小国的偏僻小天地里，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列宁全集》第16卷，第303、305页）。列宁完全支持以倍倍尔为首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评，他说，“先进阶级批评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开始进行社会革命之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同上，第310页）机会主义对这次大会的分歧表现得高兴，列宁指出他们幸灾乐祸得太早了。

同年12月，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时又特别指出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他说，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总是采用暴力和“自由主义的”两手，近50年来主要是采取让步的方式，这就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狂起来。

（二）巴塞尔大会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在欧洲各社会党中，机会主义的影响继续加强。在英国，机会主义占居统治地位；在法国叛徒布里安当上内阁首脑，但是，各国党内都出现了左派，他们坚决同右派展开了斗争。列宁坚决支持左派的斗争，他赞同意大利把

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列宁说：分裂是一件沉痛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裂时，一切软弱、一切“温情”都是犯罪。“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曾去纠正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议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全部纪律，那末分裂就有必要。因此，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把工团主义者和右倾改良派分子从自己队伍中清洗出去，是做得完全正确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

列宁支持英国左派的行动，他们反对麦克唐纳的机会主义政策，并把海德门开除出党。列宁估计到德国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特别注意德国党的机会主义势力的增长。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等文中，揭露了德国工会领袖列金旅行美国的可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指出德国党有哪些东西应当学习，又有哪些东西不应当学习。

列宁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功绩。由于马克思同赫希伯格、杜林之流的一伙人进行了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了严整的理论，也就是俄国民粹派枉然企图回避或者企图按照机会主义的观点加以修正的那个理论。这个党拥有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团体，——这就是群众的组织性。……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有功绩，并不是由于有象列金的……那样可耻的言论，而是由于不顾这些言论。我们不应该用‘表面乐观的’词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一系列的现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政党明显的病态，而应该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历史比较长的运动的经验中学习，学习有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2—253页）

列宁还进一步揭露了主张同机会主义统一的考茨基的所谓中派立场，批评了倍倍尔的软弱、调和和不坚定的错误。

这个时期帝国主义更加紧策划瓜分世界，进行战争准备。法国和德国为争夺摩洛哥几乎引起武装冲突。帝国主义者不顾群众的抗议和游行示威，继续推行它的侵略政策。1911年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黎波里发生战争。1912年10月，又爆发巴尔干战争，使国际局势异常紧张，增加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

列宁坚决谴责了意大利的血腥罪行；支持巴尔干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揭露了为本国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的沙文主义。

社会主义国际局也号召抗议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英、德、法、意等国社会党响应了这一号召。

由于形势的尖锐化和劳动群众的反战要求，国际局于1912年11月24日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会议历时两天，欧洲各社会党都有代表出席，会上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战争威胁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即一致通过了告各国人民宣言即有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重申和援引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基本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来反对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就利用它加速社会革命。宣言指出了当前各国工人运动高涨，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情绪，对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起了推动作用，宣言向各国政府提出警告，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爆发战争对他们自己是危险的。

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在会上反对这个宣言，是迫于群众高涨的反战情绪的压力。

但是，宣言也有缺点，比如宣言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身上”，这表现出对俄国工人运动的作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宣言没有明确指出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应号召反对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